

共同事业的哲学

费奥多罗夫著
摇摇■范■一摇译

Н.Ф.Федоров

ФИЛОСОФИЯ ОБЩЕГО ДЕЛА

一个独特的思想家

摇摇——费奥多罗夫其人其事

范摇一

列夫·托尔斯泰曾对人说：“我为和这样一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感到骄傲。”又说：“假如我没有自己的理论，我一定会成为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的追随者！”有谁会想到，这位受到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如此推崇的费奥多罗夫，竟是一个寂寂无名、不见经传的图书管理员。而他却提出了一套惊天动地的改造自然的计划，成为一个独特的哲学体系和人类发展史上最大胆的乌托邦的创始人和俄国宇航学的奠基人。

高尔基称费奥多罗夫是“最奇特”，“最有趣”的人。果然，他从外表到生活习惯，到世界观，都与一般人迥不相同。人们很难把他归入哪一种类型。

费奥多罗夫是一个公爵的私生子，生于一八二八年。一八四九年中学毕业后进入贵族学校。这时他已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独特的性格。一八五二年在毕业考试时他与一位教员发生激烈辩论，愤而离开学校。从一八五四年起，费奥多罗夫在一些县中学任史地教员。由于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主张不受课本限制，通过师生直接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和动植物，通过观察星球和实地试验共同获得知识，他常常与学校当局发生龃龉，因而频频更换学校。一八六七七年他徒步走到莫斯科。一八七四年起在鲁缅采夫图书馆（列宁图书馆的前身）担任馆员。一九〇三年去世。

费奥多罗夫粗衣淡食，恬淡寡欲，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一年四季，无论寒暑，他总是穿着同一件无领的旧短大衣。他身居斗室，每天

只在光溜溜的柜子上睡三四个小时。饮食仅限于面包和茶。他薪水不多,却拒绝给他加薪。而且常常济困恤穷,把大部分薪水拿去接济图书馆的看守人,或者为图书馆购买欠缺的书。托尔斯泰叹道:“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是圣人!斗室。履行!——而且自然而然。——不要薪俸。没有内衣、卧具,没有床铺”,“他一贫如洗,把一切都奉献出来。他永远乐观,温厚和平。”费奥多罗夫反对财产私有。他把财产,包括对思想的占有看成“罪恶”,因为财产和思想应当属于大家。他几乎不发表和出版著作,至多也只在外省的报刊上写点文章,而且从不署名。由他的学生在他死后整理出版的《共同事业的哲学》第一卷,按照他的这一思想,总共只印了四百八十册,全部免费赠送给各图书馆和想要得到的人,而不出售。

费奥多罗夫以学问鸿博而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知识阶层中洋溢口碑。他的博学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甚至使他带上传奇的色彩。他博览书史。据说他几乎知道鲁缅采夫图书馆所有藏书的内容。他不仅精通欧洲各主要语言,而且对不少东方语言颇有研究,一度对汉语十分入迷。他对哲学、艺术、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被称为百科全书。

费奥多罗夫独树一帜,自成一系,制订了一套“调节自然”计划,内容包括驾驭自然,改造人的机体,进入宇宙,直至战胜死亡,使先人复活。费奥多罗夫把实现这一计划称做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他认为,人必须从道德感和理性的深远需要出发,自觉地控制进化,改造整个自然。人不仅是自然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且应当反过来成为影响自然的主体。调节自然是进化的新阶段、世界发展的自觉阶段。如果说进化是下意识的、痛苦的、消极的进步,那么调节就应当成为自觉自愿的改造活动。

第一步是控制自然。费奥多罗夫断言,当我们还没有成为自然的主宰者时,自然是一股盲目的破坏性力量,它是人的共同敌人。一旦它为我们所控制,它就成为我们的永恒朋友。费奥多罗夫努力寻找调节气候、控制地球运动、磁力和太阳能的方法。他希望把风雨变成地球的通风和水利设施,把太阳系变成生产力。一八九一年在美国成功地利

用爆炸实行人工降雨。这对费的计划是一个鼓舞和推动。但费奥多罗夫的目标要大得多：“我们所希望的不是用几次射击和爆炸降雨，而是通过在广阔的空间施加影响，不仅控制湿气流，也控制干旱气流，不仅防止旱灾，也防止毁灭性的暴雨。”

费奥多罗夫以为，在调整自然的过程中，人的身体本身也应加以改造。人要做到不死，就不能保持现在这种有限的生命活动力。要运用一切发明创造来寻求一种“新人体”。这种机体应是知识和行动相结合的结果。它要有合理的营养。费主张深入研究植物的营养机制，把它作为人体改造的模式。新的人体还将包括人自己创造的新器官——人工器官。人的心理和内心世界应该在生理改造的同时甚至先期得到改造。比方说，要使活着的人念念不忘死去的先人，要使人的内心对别人具有透明度，等等。

费奥多罗夫指出，人类的活动不应囿于地球，人的活动舞台应当是整个宇宙。他认为，任何一个星球上的生活资料都是有限的，有穷尽的。由于生活资料的不足和人口的增长，死亡是无可避免的。只要地球与其他星球隔绝，就不可能有永恒的存在。惟一的出路就是走出地球，飞向宇宙，获得新的居住地，改造太阳系甚至更远的宇宙。费奥多罗夫是俄国第一个宇宙哲学家和提出征服宇宙的人。苏联“宇航学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说，他搞火箭的目的就是帮助人类迁移到宇宙空间中去。而最早影响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人就是费奥多罗夫。齐年轻时常去鲁缅采夫图书馆，费奥多罗夫为他介绍书籍，同他一起讨论，给过他许多指点。

战胜死亡，使死去的祖宗起死复生是费奥多罗夫计划中最大胆、最重要的一环。在费奥多罗夫看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就是彻底战胜死亡，使死者复活。这是人类的最高使命，最高责任，因而也就是最大的幸福。那么，如何使死者再生呢？费奥多罗夫提出，最重要的是唤醒子孙对祖先的爱和道德责任意识。这是不死的道德前提。他写道：“死亡是盲目的，不道德的力量的胜利，而普遍的复活将是道德的

胜利,是道德所能达到的至高无上的程度。”按照费奥多罗夫的看法,整个人类有如一个大家庭,一个实际上已经解体的家庭,因为在这里亲情被淡忘了。不能做到生者心系死者,子孙心系前辈,“共同事业”便无法推进。在这个问题上,费奥多罗夫也受到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费奥多罗夫提倡祖先崇拜。他认为儒家的“孝”正是崇拜祖先的表现。费奥多罗夫花了大量篇幅来阐述道德与责任,对使祖先复活的具体方法,却着墨不多。按费奥多罗夫的想法,起死回生的关键在于揭开遗传的奥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从“遗传学”着手。他的设想是通过搜集死去的人的原子和微粒来恢复人的躯壳。他认为祖先遗骸的微粒遍布物质。哪怕他们早已化骨扬灰,我们仍可找到他们的踪迹。“无论地层多厚,尸体不会一直在坟墓里沉睡,而是化作瘴气,渗入空气。”不管一个微粒如何碎裂,裂开后的微粒都会保留断口的痕迹,这些微粒最终可以对接起来,还原成昔日的人体。有了躯壳,意识怎么办呢?费奥多罗夫的推论是:既然思想、意识是物质的属性,那么有了躯体,意识自然也会恢复。“……人体是一部机器,机器装配好了,意识就会回到它身上!”

费奥多罗夫的哲学遗产主要是两卷选集。他生前只有两次比较系统地整理过他的思想和手稿。一次是在他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更全面了解他的理论时,他拿出他惟一有空的两个夏天整理出一份概要,首次系统叙述了他的思想。另一次是在去世前几年。直到这时他才答应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并动手整理手稿。可是他捱到临终前几小时才将这些材料交出来,让他的一个学生去处理。费奥多罗夫逝世后,两个终生追随他的学生——彼得松和哲学家、诗人科热夫尼科夫立即着手准备出版他的著作。他们打算出一套三卷集,定名《共同事业的哲学》。一九〇六年第一卷问世。七年后,即一九一三年,第二卷出版。原准备接着出第三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果。

费奥多罗夫的学说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矛盾的体系。在十九世纪末的俄国哲学中,费奥多罗夫的思想属于一个特殊的分支——宇宙乌托

邦。人们有时将它同傅立叶型的空想主义相提并论。但费奥多罗夫的哲学又不同于一般的乌托邦。它的矛头不仅仅指向某一社会制度,它不是建立在幻想在地球上实行公平、幸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它的矛头所向是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秩序。面对社会的不公,费奥多罗夫寻找着拯救人类的途径。他的济世良方就是“共同事业哲学”,就是他的“调节自然”计划。他把这一计划视为医治人类面临的一切社会、经济弊病的灵丹妙药。而这个计划既不符合科学规律,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含有唯心主义和极端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成分。也超越了人类发展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撇开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基本问题,回避现实的阶级关系,把一些遥远的,不切实际的任务当作迫切要解决的现实目标。费奥多罗夫把许多社会问题纳入他的“调节自然”思想轨道。例如,他把贫富问题归入生与死问题。在他看来,生与死问题包括的范围更广泛,而人类最大的贫困是生命因自然资源枯竭而得不到保障。他的这些论点,对于正在酝酿中的俄国革命和处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费奥多罗夫的社会理论和哲学思想反映了宗法制农民的保守观、落后性。列宁曾指出,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是用天真的宗法制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他把农民心理表现在自己的批判中、自己的学说中”。(《列宁全集》二十卷,597页)这些话也适用于费奥多罗夫。他的社会主张反映了改革后俄国农民阶级的希望和梦想。他主张建立“一切等级的村社”,实行理想化的专制政体,实现人人平等和全人类兄弟般的团结。费奥多罗夫在他的著作中把人分为“有文化的人”和“没文化的人”,并且常以后者自居。他所谓的“没文化的人”是指“尚未丧失亲情和强烈要求行动然而却没有文化的民众”。在他看来,只有他们才对生与死、善与恶有明白的认识。显然,他所指的正是宗法制农民。

此外,费奥多罗夫的哲学还充满宗教的象征主义。不过他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许多基督教教义重新作了解释。他把上帝,把三位一体当作复活后人类的象征和理想。他的大胆歪曲惹得维护传统的宗教哲学

家群起而攻之。

费奥多罗夫的学说有许多消极甚至反动的东西。但无可否认，它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费奥多罗夫坚决反对不可知论。他的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东西，只有未被认识的东西。他认为，科学知识负有揭示自然力量并使之为人服务的使命。只有当人实现了改造自己和世界的伟大事业时，他才能认识存在的最终原因和理由。费主张进行积极的劳动，肯定实践的作用，提倡理论知识与实际行动相一致。他写道：“惟有巨大的，世界性的劳动才能建造天堂”，“整个哲学，而且无论哪一种哲学假如只是没有行动的思想，是无所作为的。”他的改造自然计划虽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包含着积极的进化论观点和自发的唯物主义因素，其中的一些主张，如改良气候，飞向其他星球，已经或正在为科学所证实。费奥多罗夫孜孜不息，忠于理想，潜心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便是积极劳动和行动的具体体现。正是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和理论，使他成为不止一代人注意和研究的对象。

费奥多罗夫与托尔斯泰有过一段颇称莫逆的交往。托尔斯泰十分敬重他的人品和学识。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过从甚密。他们的特殊关系常常使周围的人迷惑不解。脾气急躁但待人随和的费奥多罗夫对待这位大作家就像对待一个小学生一样，呼来唤去，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从不屈己从人的托尔斯泰却输心服意地忍受这种待遇，恬不为意。谈起话来素性不羁的托尔斯泰总是特别用心地听费奥多罗夫说话，从不向他发火。费奥多罗夫反对文学作品私有。他坚持要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手稿捐给鲁缅采夫图书馆，弄得托尔斯泰有时十分尴尬，只好托词已把手稿赠送给妻子了。托尔斯泰虽然很欣赏费的品格和他的某些思想，但远不是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两人的分歧在生与死和如何看待复活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托尔斯泰相信人的精神可以不死，而肉体不能复活。观点的分歧使他们的关系日渐疏远。九十年代初，主要是出于费奥多罗夫的主动，他们终于分手。但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费的敬意。在费去世后，他依然怀念他，称他为“难忘的，最杰

出的人”。他在《复活》里塑造的革命者西蒙松的形象，便是以费奥多罗夫和彼得松为原型的。

对费奥多罗夫的思想感兴趣并受其影响的，远不止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费奥多罗夫引为同道。他说：费的想法“我读起来就好像读自己的一样”。高尔基不认识费奥多罗夫，但对他评价很高。他写道：“我们有过一位杰出的但鲜为人知的——原因是他很独特——思想家尼·费·费奥多罗夫。”此外，不少著名学者，如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文学家勃留索夫、别雷、马雅可夫斯基、扎鲍洛茨基、福尔什、普里什文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费奥多罗夫思想的影响，并在各自的著作中反映了这些思想。

费奥多罗夫和他的学说在俄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研究费奥多罗夫及其哲学遗产，对了解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化具有一定意义。在诞生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长期寂寂无闻的费奥多罗夫，重新引起了俄国学术界的兴趣和重视。他的名字频频见诸报刊，并出现在俄国新版的一些百科全书上。历史最终还给了费奥多罗夫和他的学说应有的地位。

原载《读书》一九九二年第二期

目摇录摇

一个独特的思想家

摇——费奥多罗夫其人其事

范摇一

关于友爱或亲情问题,关于世界缺乏友爱,缺乏亲情即世界不和睦状况的原因及恢复亲情的方法问题

员

卷一

员

卷二

源

卷三

员源

卷四

圆远

超道德主义或普遍结合 (即普遍联合)

猿苑

论调节

源员

摇爬行姿势和直立姿势——死与生

源猿

摇谁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惟一的、无时无处不

在的、存在于我们自身和我们以外的,但

只不过是暂时的敌人

源缘

摇作为事实和作为行动方案的天体科学

源远

摇天文学的未来

源怨

摇孤儿生活的终结 无限的亲情

源圆

关于友爱或亲情问题,关于世界缺乏友爱,缺乏亲情即世界不和睦状况的原因及恢复亲情的方法问题

卷一

没文化者致有文化者,致僧侶和俗人,致教徒和非教徒

发现采用爆炸物或战争中使用的各种手段实行人工降雨的可能性的重大意义:这一发现是摆脱饥饿和战争的手段。这是上帝存在的真实凭据,证明他确实存在。美国将这一发现当做生财之道、投机手段,实乃亵渎神圣。有文化者尚未履行的责任。调节的意义和实质。有文化者未履行其责任,使没文化者不得不向他们提出不和睦和所遭受灾难的原因问题。思想和行动的脱节导致其他种种脱节,包括贫富分化。人分化为有文化者和没文化者,这是人未成年,人类受自然支配的原因。友爱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所有的人无一能置身度外。友爱问题只是问题的提出,而非问题的解决。有文化者接受这一问题,只不过是问题的被发现,被提出而已。在有些人看来缺乏友爱的状况是没有原因的(非决定论),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种状况具有必然的、在劫难逃的即无法消除的原因(决定论)。就是说,前者缺乏认识(理论的理性),后者则只有认识而缺乏行动,没有实践的理性,只有理论的理性。法律、经济关系即缺乏友爱。这种关系转化为友爱的条件和这种转化必然到来的时间。个人和人类,以及个人与构成人类的群众的不可分问题。友爱问题的双重意义:就认识

转化为行动而言的一般意义和 圆 作为没文化者向有文化者发出的呼吁的意义。员 一般意义上的友爱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与有文化阶层的关系以及有文化者在解决友爱问题时的优势。将有文化者划为特殊阶层的必然后果和弊病是：员 把世界变成了假象 圆 把自己弄得迷迷糊糊,以及猿 催眠 或愚弄)。员 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没有解决友爱问题,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员 每一个人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有意识、有感觉、有感情的。员 按照实证论的说法,拯救非但不可能,而且不需要。进步理论排除了复活理论。当我们按照人体的样式把进步理解为社会的发展、构造时,我们便否定了成年社会的可能性。员 复活理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是有关行动的实证主义,是走出经验的出路,是排除了不可知论即认识不可企及论的任何可能性的实证主义。员 缺乏行动的认识不能解决友爱问题,不能使人得救 惟有建立在认识基础上的行动,惟有与行动紧密相联并表现为行动的认识才能拯救人。员 只要认识仍然是一种反射,它对于人这一精神生物所起的作用就是破坏性的,就会把他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但假如认识是因为要成为真正的认识而要求行动,那么,普遍的幸福——人们把它也变成了思想的目标而不是要实现的目标——将会是什么东西呢?认识要由行动来证实,而精神毁于没有行动的认识 即无所作为的认识)。员 人类的儿子 指他们的总和即处在成年期的他们)如何最佳、最自然地利用生命的问题。

为什么世界不成其为世界?

为什么在有的人看来世界只存在于世界之外,而在另一些人看来无论在世界里还是在世界之外世界都不存在?

为什么大自然不是我们的母亲,而是后娘或拒绝喂奶的奶妈?

大家是来分享舒适还是来分担劳动——自觉自愿的，认识造成饥馑、瘟疫和死亡的盲目力量并将它变成带来生命的力量的劳动？

在水旱频仍的 1914 年，正当许多号称俄罗斯粮仓的省份发生因干旱而造成饥馑，而且亢旱大有蔓延之势的时候，正当谣言四起，使得等着战争爆发的紧张气氛日甚一日的时候，突然获悉有人试验用爆炸物降雨的消息^①，也就是说，这些试验使用的是迄今为止可以说只用于对外战争以及国内战争，如革命、炸弹恐怖活动等的爆炸物。

因干旱而造成的饥馑与抗旱方法的发明发生在同一年份，而且这种方法正是往日用于互相残杀的手段，这不能不引起震动，尤其是对那些濒临饥饿线的人，对那些一旦爆发战争亲属中有人正当当兵打仗年龄的人，而且岂止他们！……人看来真是坏事做尽，无论是对大自然（资源枯竭，土地荒废，狂采滥掘），还是彼此之间（发明杀伤性武器乃至互相毁灭的工具）。就连现代人特别感到自豪的交通线，也不过是为战略或商业，为战争或贩卖服务罢了。而贩卖正是把大自然看做“一座可以获得舒适生活和享受的资料，可以肆意消耗和浪费世世代代积蓄起来的财富的仓库”哈尔科夫的阿姆夫罗西在哈尔科夫大学的讲话《论自然科学的基督教倾向》，见教会公报，1914 年第 1 期^②）。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感到绝望，因为耳接目睹的尽是恶，看不到一线光明。忽然，犹如“黑暗和死亡阴影笼罩下的人”见到一线可喜的亮光，传来了一个旋乾转坤的消息，一个福音：所有发明来互相残杀的工具正在变成拯救人类，使之不再挨饿的工具。饥馑也好，战争也好，可望一举结束，无需通过本来就难以做到的裁军便可以结束战争。这件事影响所及，连不信教的人也不可免。就是臭名昭著的无神论者也不能不把它看做是上帝

的旨意,看做是上帝在昭示世人:最大的恶可以变成最大的好事。的确,这难道不是上帝和上帝的旨意存在的绝好证明,一种全新的,并非仅仅从观察自然界的合理性获得的,而是因合理性实际上、事实上得以实现而认识到的证明么?这难道不是上帝对罪孽深重的人,对那对大自然,对自己的兄弟恶大过深,甚至连上帝的存在本身都拒不承认的人的大慈大悲么?……这怎能不令人欢呼:“上帝啊,你是对的,你的条条道路都是对的”……上帝确实听到了教会的祷告,他们在自己干旱的田地里祈祷时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只有那些嘲笑他们祈祷的人)。然而,从教堂的讲坛上竟然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当心,这是胆大妄为,它想用发射炮弹把天上的雨水引下来”(阿姆夫罗西的结束语)。可是,既然发射炮弹即便在造成死亡时也不一定受到指责(例如在保卫祖国时),那么在它带来生命,使人摆脱饥饿时,为什么倒要指责它呢?相反,这不正是秉承上帝的良好意愿吗?……这不正是从罪恶的悲观主义和忧郁的怀疑主义向生气勃勃的积极信仰转变吗?尤其是如果这是从教会的讲坛,从信仰的讲坛上对没有听说过的人说,对不了解的人说,情况就更其如此了。这时信仰就会为理性指明一条新的道路。

不能不指出,上帝创造了人以后,命他掌管大地及地上的一切。为什么将乌云从可能暴雨成灾的地方引到久旱盼甘霖的地方就应当受到谴责,为什么这就是胆大妄为,甚至像有辱上帝呢?……(《论自然科学的基督教倾向》中的话)人们从大河小溪引水灌溉决不会被看做对抗上帝,为什么根据人的需要不是将河里的水而是将气流中的水分调整一下就成了对抗上帝呢?更何况这样做不是为了穷极奢侈,不是为了肆意行乐,而是为了得到□□的粮食。

不过,《论自然科学的基督教倾向》中的谴责会不会只是针

对美国人所指望的那种利用现有发明的方式呢？……这些美国人已经在谈论特许权了，甚至想把从饥饉中拯救生命的神圣事业变成投机买卖。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能不对这一英明的批评表示敬佩了。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能够借助几次发射或爆炸去降雨，而是能利用在广阔的空间所造成的影响，既控制湿气流，又控制干气流，不但使人免受干旱之苦，也免受破坏性的暴雨之害。这是需要所有民族万众一心，协同行动的事业，因而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变成投机买卖。借助爆炸物实行人工降雨这一发明即便满足不了对它的期望，也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它指明了整个人类的行动方法。也许最后会发现炮弹引导不了水分的气流，但人们可以从战争中使用的其他手段中找到这种方法。人民教育部的奠基者和哈尔科夫大学的创始人，著名的卡拉津已经指出了一条控制自然气象的方法。这个办法就是在升入高空大气层的气球上安装避雷针^③。如果说气球还没有完全成为战争的工具，那么它已经在变成这种工具了。如今一切都为战争服务，没有一项发明未被军人用于战争，没有一项发明人们不是汲汲地将它用于战争。倘若责成军队将现在投入战争的一切用于控制自然力量，那么，军事自然就会变成人类的共同事业。

圖歉收，尤其是 1932 年的饥饉迫使无文化者提醒有文化者注意他们的出身及缘此而来的他们的任务：着手研究造成歉收、致命的瘟疫的力量，即把自然作为带来死亡的力量加以研究，把这一研究作为神圣的但又最简单、最自然和最明白无误的职责，及圖在研究和控制盲目力量的事业中联合所有的人，包括有文化者和没文化者。对于有意识的人来说，不可能有别的任务，别的事业。等待本该让这个有意识的人支配而又尚未为他所支配的盲目力量会自动带来好处，带来好收成，这是再幼稚不过的事，何况是在这样的年份，在担饥挨饿的 1932 年。1932

年的巴黎展览会和在莫斯科举办的法国展览会便是这种幼稚的表现*。这能不说是上帝对我们老是未成年感到恼怒么！……他又怎能不对我们感到恼火呢：我们没有履行他的约言——要具备真正的理性。这约言的精神就是要大家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他和圣父同为一体一样。而惟有在共同的父亲的事业中我们才能成为统一体。有文化者将科学划分为许多独立的科学，他们认为，落到我们身上，令我们痛苦不堪的灾难是受专门知识管辖的，而不是大家的共同问题，不是盲目力量以缺乏亲情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些有理性的人的问题。这种力量看来没有向我们索取任何东西，除了它所没有的，它所缺乏的东西，即驾御的理性，调节的理性。当然，在我们不和睦的情况下，调节是不可能的，但不和睦之所以存在，却是因为没有共同的事业。而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共同事业的伟大壮举的，就是调节、控制盲目的自然力量。

调节气象过程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保证丰收，不仅是为了农业，也是为了使那些开采煤矿和铁矿的井下矿工摆脱苦役般的地下作业。这些矿藏是整个现代化工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用直接从大气流，从造就了蕴藏的煤矿的太阳能汲取的动力来取代这种开采方式，就需要进行调节。因为井下矿工的处境异常艰难，忽视这种状况是不可原谅的。而社会的敌人，那些社会主义者正是利用他们的处境来煽动闹事的。因此，调节、控制气象过程既是解决农业问题，也是解决工业问题的途径。

* 费奥多罗夫著有专门文章评论 1889 年的展览会。他对这类展览会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反映了资产阶级消费方式及崇拜“工场手工业玩具”、追求享乐的心理，其背面则是军国主义，是积累破坏工具。——译者注